

的爱与悲

与国际灾童教养院的往事



沙耆与父亲沙松寿合影。



沙耆出国前与家人合影。

被战乱撕裂的爱情

沙天行说，父亲出国留学，一走就是十年。在国外的这十年，坊间流传着各种传言。有人说他在国外有了钱，有了女人，后来被欺骗发疯了，才回国。

从沙天行懂事那刻起，这些关于父亲的闲言碎语就伴随着他。他一直想弄明白，父亲在比利时的那十年，究竟是怎么生活的。

后来，沙天行花了很多年的时间，搜集了许多父亲的手稿和日记，询问父亲在比利时的同窗好友，父亲在比利时的十年艺术生涯才渐渐清晰起来。

沙耆，曾是当年比利时家喻户晓的中国画家。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曾亲自选购他的作品《吹笛女》珍藏。

他毕业的时候，获得艺术界不易多得的“至高美术金质奖章”，是由布鲁塞尔市长马格斯亲授的。引起当时比利时美术界的惊异与重视。

虽然沙松寿希望儿子学成后立时归来，可是正在艺术辉煌期的沙耆，怎能放弃自己如日中天的绘画事业？

他靠卖画自给自足，可是画廊给的分成很不合理，他也曾声嘶力竭地争取过吵嚷过。

一个孤独的异乡人在比利时的处境，可想而知。在压抑狂躁的情绪下，沙耆对妻子的思念愈来愈浓，他准备回国了。

然而，孙佩钧早已选择了不同的道路。

1943年，国际灾童教养院正式宣告解散。在丈夫回来后，经沙耆的堂兄弟史永（原名沙文威，沙文汉四弟）介绍，孙佩钧投奔了新四军革命根据地，被分配到苏皖边区工作。

“我站在船上看着大红色的落日，我想到你，我的朋友，落日那边是我的家乡。”这是沙耆回国时在明信片上写下的话。

落日那边，有他的家乡，他的父亲，他的妻子和儿子，那是他朝思暮想的地方。

1946年10月，沙耆回来了。他搭乘法国邮轮回到上海。去上海码头接他的一共有三人：孙佩钧的弟弟孙荫堂、沙展世（沙孟海的长子）、四嫂（沙孟海四弟史永的夫人）。

没有慈祥的父亲，没有日夜思念的妻子，也没有可爱的儿子。

“佩钧在哪里？我儿子在哪里？”沙耆暂住在上海的史永家，晚上发疯一般地捶东西，惊动了周围的人。这时，大家才发觉他精神出了问题。

史永的家是地下党联络站，沙耆每天大吵大闹找妻儿，影响到地下党机关的安全。

组织上派孙佩钧立即去上海处理，稳定丈夫的情绪。孙佩钧接到组织的命令，立即出发上路。

也许是造化弄人，缘分已尽。那天，孙佩钧走了一天又折回原地，因为江苏阜宁失守，交通受阻，无路可行。

过了很久，这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
1949年，沙耆与妻子协议离婚，沙孟海先生陪同办理，孙佩钧自始至终没有出现。

也许，他们对彼此的印象，还停留在初见时芬芳的刹那。两个人的思想与生活路径却在十年的动荡不安中愈行愈远。

沙村的宅老墙壁上，都是沙耆画的裸女，他整个人痴痴癫癫的，常常语无伦次，只有在他的画里，才能看到他汹涌翻滚的思念与感情。

三嫂陈修良曾经劝慰他：“别等她了，我再给你找一个好姑娘吧。”

沙耆嘿嘿一笑，沉默不语，终身没有再娶。

沙天行说，父母的婚姻一直有很多传说和议论，但其实这不是一个孤立的婚姻问题。

这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，在那个战乱动荡的年代，向命运抗争的时代缩影。

“那一代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理想追求。当命运需要他们做出选择的时候，母亲选择了革命，父亲走向了艺术。”

他们都忠实于血液里涌动的爱和渴望，各自奔向红尘与远方。

积劳成疾卧病泰清山

泰清寺里有一口古钟。古钟很老了，锈得黑里透红。风拂过，发出苍然悠远的声音。

远行的人置身其中，会有一种“古木无人径，深山何处钟”的错觉。

为了扩建宽敞明亮的教室，沙松寿搬走了古寺里的佛像香台，唯独留下了这一口铜钟。擦拭一新，钟声也清亮了许多。

1938年9月，一群穿着清一色白衬衫、海蓝色背带短裤的孩子们，从鄞县横溪上岸，在徐锦华等老师们的护送下，徒步向奉化泰清山走去。

那天下午3点多，当孩子们出现在泰清山下的琅溪桥畔时，沙松寿撞响了古钟，钟声宏阔嘹亮，在山谷回荡盘桓，像是欢迎竺梅先院长和徐锦华副院长，以及500多个孩子们。

此后，沙松寿被聘任为

教养院的总务主任，管理全院的生活和教学经费以及一切后勤琐事。

为了节省开支，他还创建了教养院农场，占地20亩，师生们日常食用的蔬菜基本可以自给自足。

第一批院童来了500多个，后来又进来100多个，加上教职员一共近700人。

每天的大米运输，经过鄞县横溪到教养院这段路，都是沙松寿安排人员徒步背进来的。

教养院开办一年后，到了秋叶飘零的季节，79岁的沙松寿工作极度劳累，渐渐体力不支。最后还患了痛风，腿脚无法行走。

医生暗地里告诉孙佩钧：“沙老病人膏肓，无力回天，让他静心养息，准备后事吧。”

沙松寿却一下子脱不开身，教养院的诸多事情都由他经手，一时半会儿还不能

转交给别人。

孙佩钧曾给远在比利时的沙耆发父亲病危的电报，仍是泥牛入海，杳无音讯。

一天早上，竺梅先从外地筹粮回到教养院，听说沙老病重，连脸也没擦洗一把，就直奔沙老的病房探望。

见到竺梅先，沙松寿挣扎着起来，提出两个请求：第一，希望下午竺院长能陪他到院里走走，让他最后看一眼教养院；第二，要求第二天就送他回沙村，不想再给大家增添麻烦。

那天下午，竺梅先弄来一顶软轿，扶沙松寿坐下，徐锦华、孙佩钧和一些老师紧随轿子左右陪伴。

从院内到院外，从教室到图书馆，从食堂到农场，沙松寿静静地看着自己亲手修建起来的一切。

一群天真烂漫的院童跑过来，沙老欣慰地笑了。

1939年底，一个寒气象

孙佩钧教唱抗日歌曲

教养院创办初期，急需老师，当时徐锦华请沙老想办法。沙松寿马上想到曾当过老师的儿媳妇孙佩钧。她正独守空房，在家抚养年幼的儿子沙天行。

他写了一封信去沙村，探问她是否愿意去教养院教书。孙佩钧接到公公的信，喜出望外，马上回信：自己一个人在家闷得慌，正愁没事做。

开学后，孙佩钧便抱着1岁的沙天行去教养院报到。22岁的她，是全校教职工中最年轻漂亮的老师。

徐锦华看到她灵气逼人的样子，也很是喜欢，聘她当教养院的音乐与数学老师，把她当自己的女儿看待，体己话都愿意跟她说。

教养院的孩子大都是失去父母的贫苦孩子。他们在教养院吃饱穿暖，远离战火，内心深处却一直盘桓着失去至亲、流离失所的阴影。

徐锦华与孙佩钧商量后，一致认为，除了读书，孩子们应该多参加文娱活动，用艺术陶冶情操，忘记心中的苦痛。

组织文娱活动，正是孙佩钧的长项与爱好。于是，她以满腔热情组织抗日歌咏队和文艺宣传队，在班上教孩子们唱抗日革命歌曲，如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》《松花江上》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等。

蒋桂珍同学人长得漂亮，声音也清脆婉转，孙佩钧教她在班上唱《流亡三部曲》：

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森林煤矿，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……”当唱到“哪年哪月，才能

人的清晨，一顶暖轿上坐着沙松寿。竺梅先嘱咐孙佩钧与一行人护送沙老回沙村，要求沙老好好养病。

临走前，竺梅先还亲手放下暖轿的帷幔，吩咐起轿。沙松寿掀开轿帘，挥手告别。

泰清寺的钟声又响起来了，伴着孩子们童稚的回音，震颤着给沙老送行。

1943年，沙松寿到了油灯燃尽之时，他把儿媳孙佩钧叫到病榻前，把整个家业交给她，还叮嘱她：“不管沙耆今后是死是活，回来还是不回来，一定要把孩子带大。”

说完这句话，沙松寿就离开了人世。也许他唯一的遗憾，就是没能见儿子最后一面。

竺梅先最早知道这个噩耗，徐锦华也听闻了，她马上通知全院：停课一天，哀悼教养院的修建者沙松寿。

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……爹娘啊，爹娘啊，什么时候，才能欢聚一堂……”时，蒋桂珍哽咽了，院童们都伏在课桌上哇哇大哭，孙佩钧也不禁停下了弹琴的手，泪眼朦胧。

孙佩钧还带学生们到附近的乡镇演出抗日节目，激发了孩子们与村民们的抗日热忱，受到竺梅先院长的多次表彰。

也是在那个时候，孙佩钧深受教养院抗日氛围的感染，她想参加革命的愿望生根发芽，愈来愈强烈。